

王明蓀主編

古代歷史文化

研究
輯刊

十七編 第二四冊

顧炎武的著述體系與學術思想

趙陽 著



古代歷史文化

研究
輯刊

十七編

王明蓀主編

第24冊

顧炎武的著述體系與學術思想

趙暘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顧炎武的著述體系與學術思想／趙暘 著 — 初版 — 新北市：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7〔民 106〕

目 4+202 面；19×26 公分

(古代歷史文化研究輯刊 十七編；第 24 冊)

ISBN 978-986-404-964-6 (精裝)

1. (明)顧炎武 2. 學術思想 3. 著述考

618

106001490

ISBN-978-986-404-964-6



古代歷史文化研究輯刊

十七編 第二四冊

ISBN：978-986-404-964-6

顧炎武的著述體系與學術思想

作 者 趙 暘

主 編 王明蓀

總 編 輯 杜潔祥

副總編輯 楊嘉樂

編 輯 許郁翎、王筑 美術編輯 陳逸婷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社 長 高小娟

聯絡地址 235 新北市中和區中安街七二號十三樓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hml810518@gmail.com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初 版 2017 年 3 月

全書字數 184835 字

定 價 十七編 34 冊 (精裝) 台幣 68,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顧炎武的著述體系與學術思想

趙 暘 著

作者簡介

趙暘，男，1980年生於天津，回族，畢業於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院，歷史學博士，研究方向為中國史學史，現為天津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講師。天津市青聯委員。代表性論文有《顧炎武對明代空疏學風痼疾的深層認識》，發表於《史學集刊》2009年第6期；《論日知錄的史論性質》，發表於《河北學刊》2014年第2期；《顧炎武關於「人盡其才」的史論》發表於《史學理論與史學史學刊》2013年卷。

提 要

顧炎武是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他一生著述頗豐，其中《日知錄》代表了顧炎武學術成就的最高峰。他以非常嚴謹的態度、以科學實證的方法來撰寫《日知錄》。《日知錄》凝聚了顧炎武畢生的心血。《日知錄》集中表現了顧炎武思想體系。《日知錄》是一部批判封建專制和理學空談的史論著作。它以「下學而上達」作為基本表述原則，並以儒家思想為指導思想，對明朝何以會以「天崩地解」的方式滅亡這一歷史命題，展開論述，對明朝封建專制的實質以及空疏學風都進行了深入地分析。《日知錄》各部份之間、各卷之間都存在著一定的聯繫，這又說明《日知錄》是一部具有一定體系的史論著作。《日知錄》明確地表達了顧炎武幾乎貫徹一生的治學方法「下學而上達」。他對問題的認識是從事物感性認識入手，逐步推進而上升到對事物的理性認識。而他對事物的闡釋也是通過最直觀的形式表現出來的。《日知錄》是顧炎武貫徹「下學而上達」治學之法集中的體現。他對問題的深入認識是在大量的閱讀書籍，並在不斷觀察求證中而獲得的。

《日知錄》是顧炎武整個著述體系中的高峰。《天下郡國利病書》和《肇域志》中的成就在《日知錄》那裏得到了集中的體現。《日知錄》可以看作是顧炎武晚年對自己一生學術活動的總結。《日知錄》具有一定的著述體系，這回應了有人將顧炎武的著作看成是考據式、札記式的著作，回應了對顧炎武是否可以稱為思想家的質疑。

顧炎武對具體問題的論述正是通過「下學而上達」的著述形式表現出來的。顧炎武對重大歷史問題以及主要社會問題都作了闡釋，而重點是揭示明朝滅亡的原因。他從行政體制、財政貨幣政策、以及科舉教育制度等等方面，論述了這些制度的危害，揭示了封建專制剝削人民、與民爭利的實質。他又對當時出現的種種社會問題進行了分析，指出君主對於社會風俗所產生的影響。他通過敘述歷史，批評了明朝封建專制體制。他批評了明代空疏學風，強調了士人應該履行社會責任。他寄希望於通過學術活動改造士人腐朽墮落的習氣，使學術活動回到經世致用這個根本目的中去。

顧炎武是中國學術史上承前啟後的關鍵人物。他批判了宋明理學，為新學術的建立，掃清了榛杌，同時他建立了新的學術體系，強調了真理來源於現實生活，來源於科學嚴謹的實證，這為清代樸學的興起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同時他強調了學術應該經世致用，應該能為社會生活服務，這又為嘉道時期的「經世學風」的興起指明了方向。他的學術思想值得後人不斷發掘探討。



目

次

緒 論	1
一、選題意義	1
二、學術史回顧	3
三、論文結構	13
第一章 時代環境與顧炎武學術思想軌跡	17
第一節 明代社會危機與天崩地解的歷史巨變	17
一、明代中晚期出現的資本主義萌芽與顧炎武學術思想關係的檢討	17
二、明代封建專制統治造成的社會危機	20
三、顧炎武所處時代的歷史劇變	28
第二節 顧炎武的學術思想軌跡	31
一、顧炎武的家學淵源	31
二、顧炎武的生平經歷	33
第二章 顧炎武《日知錄》的著述體系研究	41
第一節 《日知錄》的史論性質	41
一、「撥亂滌污」：《日知錄》的著述宗旨	41
二、總結歷史經驗，批判封建專制的禍害	44
三、回歸原始儒學，倡導經世致用	49

第二節 《日知錄》內容的邏輯結構	52
一、《日知錄》中「經術」、「治道」、「博聞」的關係	52
二、《日知錄》卷與卷之間的關係	55
第三節 「下學而上達」：顧炎武的研究方法	58
一、顧炎武借材料彙編闡釋思想	59
二、「下學而上達」：顧炎武的研究方法	63
第四節 《天下郡國利病書》、《肇域志》的性質	71
一、《天下郡國利病書》與《肇域志》的著述目的	71
二、《天下郡國利病書》關注的重點問題	73
三、《天下郡國利病書》和《肇域志》的性質	81
四、《歷代帝王宅京記》的主要內容	83
第三章 顧炎武對重大歷史問題的看法	87
第一節 顧炎武的歷史情結	87
一、歷史是可以認識的	87
二、顧炎武的歷史理論依據	89
第二節 顧炎武對明代行政體制弊端的反思	92
一、明朝行政體制弊端具體表現	92
二、顧炎武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主張	94
三、顧炎武行政體制改革思想的實質及其對後世的影響	101
第三節 明代財政與賦稅問題	103
一、明代的君主缺乏基本的貨幣常識	104
二、顧炎武對賦稅問題的認識	105
三、財政賦稅政策反映出明朝封建專制與民爭利的實質	108
第四節 顧炎武對宦官問題的歷史思考	110
第五節 中原民族與邊疆游牧民族及周邊國家的關係	113
一、文化在中原民族與游牧民族戰爭中的影響	114
二、中原王朝民族政策的失誤	115
三、邊境少數民族的由來	116

第六節 顧炎武論明代的科舉制度的弊端及反思	117
一、明代科舉制度的弊端	117
二、科舉制度弊端對人才的敗壞	120
三、顧炎武改革科舉制度弊端的意見	121
第四章 顧炎武對重要社會問題的認識	125
第一節 「人心風俗」治亂之關	125
一、君主對社會風俗的決定影響	125
二、儒家思想對建立良好社會風俗的意義	129
三、社會風俗與治亂興衰的關係	132
第二節 顧炎武論社會生活中的陋習	134
第三節 顧炎武論明代空疏學風	137
一、明代空疏學風的具體表現與實質	138
二、剖析封建專制與空疏學風的關係	141
第五章 顧炎武學術思想主要價值和歷史地位	147
第一節 對傳統儒家思想繼承和超越：「經學即理學」的思想	147
一、顧炎武對理學的批判	147
二、以史學代替理學——對原始儒學發展的新創獲	162
三、對顧炎武「實學」性質界定	165
四、與同時期思想家黃宗羲、王夫之思想之異同	168
第二節 顧炎武的學術思想對乾嘉考據學的影響	173
一、顧炎武為清人提供了治學方法	174
二、顧炎武與乾嘉考證學風	177
第三節 顧炎武學術思想對嘉道時期經世學風的影響	181
一、顧炎武在嘉道時期的廣泛影響力	181
二、嘉道時期經世派對顧炎武思想的發揮	184
結語	191
參考文獻	195

緒 論

一、選題意義

明末清初是中國歷史上社會急劇變革的時代，反映在學術領域上，湧現出一批起著承前啓後作用的優秀思想家和史學家。這些優秀學者在批判繼承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爲後代的學術開闢了新的道路。顧炎武正是這一歷史變革時期學術界的傑出代表。他與當時出現的黃宗羲、王夫之並稱爲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顧炎武對清代學術影響巨大。他的重視考據、實證的學風開創了有清一代樸學之風的先河。但是他的學術精華並不在於此。清代學者朱一新認爲如果把顧炎武學術僅僅看作是考據之學，那是「葉公好龍」、「買置還珠」〔註1〕。顧炎武最爲突出的成就在於「講求實學和學以致用兩個方面」。他的學術的出發點在於「博學於文，行己有恥」，「要以自己負責的態度，做講求廉恥，力避虛妄的有本之人，治經世致用務實之學」〔註2〕。顧炎武爲了使自己的學術思想成果對現實有借鑒意義，他自年輕時就開始著述《天下郡國利病書》，從民眾的角度論述了當時有關國計民生政策的弊端。《天下郡國利病書》成爲後人研究當時政治經濟情況的重要書籍，這是他的經世致用學風的特點所在。自三十八歲到他即將去世的前夕，他把絕大部份生活精力都投入到《日知錄》的撰述當中。《日知錄》全書貫穿著他關於如何才能有利

〔註1〕 朱一新：《答朱永觀問亭林張氏二陸爲學》，《無邪堂答問》中華書局 2000 年版。

〔註2〕 白壽彝主編：《中國史學史》第五卷（向燕南、張越、羅炳良著），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67、168 頁。

於「治道」的思考。顧炎武堪稱是能夠將學術與政治社會生活有機結合的典範。他的很多觀點和思想都切中了當時政治社會生活的嚴重積弊。因此，他也成為清代以至近代以來為學術界廣泛關注的人物。正如已故著名史學家楊向奎先生曾明確地指出的那樣：「清初學術思想是對中國傳統學術思想的反思和總結，在學術史上，這是一個光輝的時代」〔註3〕。而顧炎武正是這一學術光輝時代的開創者。因此對顧炎武這個人物及其思想的研究是具有很高學術價值的。

要研究顧炎武是如何將學術成果為政治社會生活服務的，那麼就需要先正確地認識顧炎武的學術思想，揭示顧炎武的學術思想本來面目也是當前學術界主要研究課題。既然是思想，那麼它就不僅僅是一個個孤立觀點的集合，而一個具有一定邏輯脈絡的思維過程。因此本課題的主要任務就是要釐清顧炎武的思維脈絡，通過對思維脈絡的釐清，發掘其中具有深刻內涵的學術觀點，並認識顧炎武學術的主要貢獻。本課題力圖從學術史的角度，應用學術史和史學史的基本方法來揭示一個全面、有一定邏輯體系、且有一定深度，同時具有極其實貴時代價值的顧炎武思想。

本課題研究的意義主要有四項：

（一）顧炎武是中國思想史上為數不多的具有崇高歷史地位的思想家，必須對他的著作體系和思想內涵作出深刻地分析，並回答顧炎武的學術思想與他所處的時代大變革是什麼關係。他的思想與時代相結合，這是顧炎武思想精華之所在。顧炎武結合了他對時代的感受和體會，回答了那個時代的重大問題。他的思想對當時以及以後的學術研究和社會發展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因此我們需要對顧炎武著作的歷史觀、政治觀、學術發展的道路和他產生的巨大影響做出進一步實事求是地分析和現代審視，在前人的研究基礎上，對顧炎武思想作出科學的定位。

（二）當前總結傳統文化，弘揚民族精神是我們史學工作的重大任務。顧炎武作為清初思想家，是一位具有很高歷史地位的人物。他將中國的傳統文化與明末社會危機的時代特點相結合，尋求解決明末社會危機的道路。通過對顧炎武思想內涵和時代價值分析，我們可以推進理解中華文化在明清之際是如何發展的，時代精神是如何提升了中國的傳統文化，有助於我們理解明末思想活

〔註3〕楊向奎：《清初學術思辨錄·序言》，見陳祖武：《清初學術思辨錄》，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版。

動急劇變動的時代在傳統學術發展中所具有的重大意義。顧炎武回答了什麼問題？這對我們把握這一時代思想價值的核心具有十分關鍵的意義。

（三）回應顧炎武研究問題，從而思維出正確的研究方法和治學方法，既承認顧炎武思想成就，又不過份拔高，對他的思想有正確的認識，以更好地樹立實事求是分析問題的優良學風。通過關注學術前沿問題，對他的學術成就作深入的發掘。真正發揚實事求是的優良學風，這體現了唯物史觀對學術的指導作用。

（四）在肯定前人的研究成果，特別是在白壽彝先生、趙儷生先生、侯外廬先生、張舜徽先生、陳祖武先生有關顧炎武研究方面的學術成果的指導之下，進一步闡釋顧炎武的思想觀點之間的聯繫，進一步發掘顧炎武思想的具體內容。當前學界在顧炎武思想研究中，存在的如注重對其知識點的積累，而忽視對其邏輯體系的把握，忽視其觀點之間的內在聯繫等等問題；這些存在矛盾的觀點主要集中在：什麼是顧炎武思想體系的核心？什麼是造成顧炎武思想產生的原因？顧炎武的本意與顧炎武思想客觀價值是怎樣的關係等問題。如果不能將這些問題講清楚，就會產生出不同邏輯脈絡的顧炎武思想體系，那麼是否有真實的顧炎武思想就要值得懷疑，那麼歷史是否有歷史真相也值得懷疑。本文通過系統梳理顧炎武學術著作的著述體系，對顧炎武的思想體系和思維脈絡作整體地把握，可以避免因為佔有史料和認識上的局限，得出不符合顧炎武本意的思想體系；可以回應和糾正當前學術界在顧炎武思想體系問題上的邏輯矛盾，區分顧炎武的思想本意和客觀價值，揭示真實的顧炎武思想和他對於現實生活具有意義的思想。

總之，對顧炎武著述體系和學術思想作專題的深入探討，無論是從學術價值，還是現實價值上講，都是具有重要意義的。

二、學術史回顧

顧炎武生前就是一個有著很高名望的學者，而他去世後，他的學術思想和方法便成為清代學人研究和關注的對象。清代著名學者對顧炎武思想成就有著比較深刻的認識，給予了顧炎武學術以很高的評價。到了近現代，顧炎武作為中國學術史和史學史上具有里程碑式重要學者，學術界對之進行了廣泛和深入地研究，出現了許多關於顧炎武專題的研究成果，並被許多思想史、學術史著作作為重點論述對象。

清代學者繼承和發展了顧炎武的學術特點。顧炎武的學術特點在於：糾正了晚明的不重視經典，言之無據的空疏學風。通過注重考證和歷史敘事來闡發自己的觀點。歷史考證是顧炎武實現經世致用的手段。而清代的乾嘉考據學繼承了顧炎武重視考據的特點，將顧炎武視為「清學開山」。洪亮吉、凌廷堪、《四庫全書總目》的作者、江藩等學者均持這種看法，如凌廷堪說：「學術自亭林、潛邱以來，士漸以通經復古為事」〔註4〕。江藩以為顧炎武兼備宋學重視思辨和漢學重視考證之長，「深入宋儒之室，但以漢學為不可廢耳」〔註5〕。另一部份學者肯定了顧炎武的考據學的功力，但同時更注重於揭示顧炎武考據學背後所隱含的經世致用的精神。顧炎武的學生潘耒點出了顧炎武學術的精髓在於「其術足以匡時，其言足以救世，是謂通儒之學」〔註6〕。而在考據學盛行時期，浙東學派代表人物全祖望和考據三大家之一的錢大昕等人均認為，顧炎武學術的核心價值在於經世致用的精神，「非僅以該博見長」〔註7〕。這些學者都已認識到顧炎武學術的精華所在。而到了晚清，社會危機矛盾日益顯現，顧炎武的經世致用的時代意義更加凸現。在維新變法時期，維新志士譚嗣同認識到顧炎武批判八股科舉考試弊端的意義。他說：「顧亭林悼八股之禍，謂不減於秦之坑儒。愚謂凡不依於實事，即不得為儒術，即為坑儒之坑。」〔註8〕1906年革命黨領袖章太炎發表《革命的道德》一文，指出顧炎武的道德學說是把革命者從道德墮落中拯救出來的唯一良藥。章太炎指出了顧炎武思想的精髓在於道德，「而非政治經濟之云云」。這是「今人以為常談」，而沒有理解之處〔註9〕。章太炎這一對顧炎武思想精髓的看法對於我們把握顧炎武思想的主旨具有一定的啟發意義。

梁啟超開創了中國的新史學。顧炎武作為對清代及其此後的學術以及社會發展具有著廣泛影響力的學術思想家，他的思想本身，以及思想形成的原因，思想價值，成為學術史重點的研究對象。梁啟超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

〔註4〕 凌廷堪：《覆錢曉徵先生書》，《校禮堂文集》卷24，中華書局1998年版。

〔註5〕 江藩：《國朝漢學師承記》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864頁

〔註6〕 《潘耒原序》，《日知錄集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

〔註7〕 錢大昕：《〈天下郡國利病書〉題記》，《天下郡國利病書》，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01年版。

〔註8〕 譚嗣同：《報貝元徵書》，《譚嗣同全集》中華書局1981年版。

〔註9〕 章太炎：《思鄉原》，《太炎文錄初編》卷一，上海書店據古書流通處，1924年第31～32頁。

史》和《清代學術概論》給予顧炎武學術以很大的關注，對顧炎武的學術特點和著述體系、以及思想價值都進行了比較詳盡地論述。解放前，關於顧炎武研究成果還有：何貽焜《顧亭林先生的社會觀》、繆鎮藩《顧亭林的經世思想》、李源澄《亭林學術論》等論文。這些成果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顧炎武思想的本意，如強調了顧炎武思想的儒學特點，但是對顧炎武思想的邏輯體系缺乏比較深入地闡述，論述內容顯得比較寬泛。

建國以後，顧炎武研究進入了比較繁榮的歷史階段。很多著名的史學家都對顧炎武個案研究投入了熱情和心血，出現了很多關於顧炎武研究的專著和論文。很多中國史學史和中國學術史著作對顧炎武的著作、學術特點和學術思想，做了比較詳盡地論述。有的學者甚至為顧炎武研究投入了畢生的精力，如著名的蘭州大學歷史系教授趙儷生自解放前直到他臨去世前，一直在孜孜不倦地著述著關於顧炎武的論文。

自近代以來，學術界對顧炎武思想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是顧炎武的政治思想。顧炎武提出了著名的「寓封建於郡縣」理論。學界普遍承認這是一個「地方分權」的理論。但是關於是什麼性質的「地方分權論」，學術界的觀點存在著一定的分歧。有的學者認為，這一理論並不具有新意，其「『重氏族』、『行世官』、『寓封建於郡縣』是復古主義倒退的辦法」〔註10〕。有的學者認為這是一個限制中央集權，具有資本主義啓蒙作用的思想，如侯外廬、錢穆、張舜徽等學者均持這樣的看法。侯外廬認為顧炎武是在進行託古改制，目的是在「反對君主專制」〔註11〕。錢穆則更進一步稱之為「地方自治之先步也」〔註12〕。但有的學者則認為「寓封建於郡縣」理論並不具有資本主義民主的特點，它不過是對原有封建體制的一種修補〔註13〕。解放以前，學者繆鎮藩認為，顧炎武「寓封建於郡縣」是一個提高官員工作責任心的體制，「使一班有官守的人，不得託故卸責，不得推諉它人，非竭盡才力，勉為好官不可」〔註14〕。趙儷生持相同的看法。瞿林東先生對「寓封建於郡縣」的性質把握是恰當的，他指出，「『寓封建之意於郡縣之中』的解釋」使得「其專在下」的封建制與「其專在上」郡縣制「達到某種程度的

〔註10〕 任繼愈主編：《中國哲學史》第4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4頁。

〔註11〕 侯外廬：《中國思想通史》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47頁。

〔註12〕 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第163頁。

〔註13〕 趙儷生：《顧炎武〈日知錄〉研究》，《蘭州大學學報》1964年第1期。

〔註14〕 繆鎮藩：《顧炎武的經世思想》，《經世》第1卷，第9期，1937年5月。

調和，確是具有理性主義的天才設想」〔註15〕。此外，李書增等主編《中國明代哲學》一書也認為「寓封建於郡縣」的實質在於「使地方官吏可以自主地發揮作用」〔註16〕。

關於顧炎武的「亡國」與「亡天下」的理解，學術界也存在著分歧。有的學者認為這反映了「封建正統意識和民族主義的觀念」〔註17〕。而何貽焜認為顧炎武的「亡天下」的重點不是在闡釋民族主義，而是「係指社會道德淪亡」。所謂的「天下」不妨說是「道德的宇宙」〔註18〕。何貽焜的觀點是符合顧炎武本意的。

其二，顧炎武的經學思想。顧炎武說：「古之所謂理學，經學也；今之所謂理學，禪學也。」全祖望將這一思想概括為「經學即理學」的思想。學術界對顧炎武「經學即理學」的理解存在著一定的分歧。

有的學者認為這句話說明顧炎武是擁護理學的。李源澄指出，顧炎武並非不談心性，「但不能人人語之耳」。顧炎武攻擊的是理學末流，但難免矯枉過正，「初竟在王學流弊，孰知其所尊崇之程朱亦受其累」。顧炎武的朋友都是理學的名儒，「而其立身亦無不合乎理學，則知亭林之所斥者，僞理學也。惟其言直截，不無過激，而其所以影響清代最大者，亦正在此」〔註19〕。牟潤孫也持相同的看法，他認為顧炎武所說「今之所謂理學」乃是明代理學，顧炎武「非不講理學，特不講離經之理學耳」〔註20〕。黃啓華也持相同的觀點。他指出，顧炎武這句話是在「辯證理學應以何種學術為內涵的問題」〔註21〕。

另一派觀點則針鋒相對，認為顧炎武是反對理學的。繆鎮藩認為，顧炎武「反對程朱等之理學」，「謂『經學即理學』，而二程之理學，實即禪學」〔註22〕。王茂則認為：「古之所謂理學，經學」的意思是「義理之學」，但是講義理應根據《論語》，而不要「別求於後儒的語錄」，「顧炎武對宋明哲學採

〔註15〕 瞿林東：《中國史學史綱》，北京出版社2005年版，第700頁。

〔註16〕 李書增：《中國明代哲學》，河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635頁。

〔註17〕 陳祖武：《清初學術思辨錄》，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58頁。

〔註18〕 何貽焜：《顧亭林的社會歷史觀》，《師大月刊》第22期，1935年。

〔註19〕 李源澄：《亭林學術論》，《論學》第5期，1937年5月。

〔註20〕 牟潤孫：《顧寧人學術之淵源》，《中國哲學思想論集·清代篇》，臺灣水牛出版社1992年版，第46～66頁。

〔註21〕 黃啓華：《乾嘉考據學興起的一些線索兼論顧炎武、錢大昕學術思想的發展關係》，《故宮學術季刊》（臺灣）第八卷，第三期，第114頁。

〔註22〕 繆鎮藩：《顧亭林的經世思想》，《經世》第1卷，第9期，1937年5月。

否定態度，而所尊奉的乃是孔子的原始儒學。但是顧炎武對朱熹所定伊洛道統，卻完全加以肯定」〔註 23〕。而周予同、湯志鈞則認為顧炎武「所崇尚的經學實是東漢的古文經學」〔註 24〕。

關於全祖望對顧炎武經學思想的歸納「經學即理學」是否代表了顧炎武的本意，學術界也存在著一定的分歧。余英時與侯外廬二先生從不同的出發點得出了不同的解釋。余英時以為原始儒學包含了理，程朱理學追求的「理」正是原始儒學中所存在的理，所以他認為「經學即理學」是「大體上符合亭林本意」〔註 25〕，而侯外廬則先有理學的概念，認為理學本與經學不同，所以理學不同於經學，因而說全祖望講「經學即理學」混淆了兩個概念，他認為顧炎武這段話的意思是「理學為經學的一部份，言理不能離經」〔註 26〕，很顯然余英時對全祖望關於顧炎武經學思想的概述是準確的。

顧炎武與朱熹之間存在著一定的分歧，但分歧何在，學術界也有不同的觀點。有的學者否定顧炎武所謂「一貫」具有從經驗上升到原則的「上達」意義。顧炎武認為「一貫」，「只不過是『忠恕』」。「顧和朱在『一貫』上的分歧就在朱為『上達』，顧為『下學』。這關乎對孔子乃至全部儒家教義的根本理解，也正是原始儒學與宋代理學的主要分界。」顧炎武反對朱熹向上一層思辨，「然而對朱熹的『下學』塊，他是贊同的」〔註 27〕。陳祖武先生則從三個方面論證了顧炎武與朱熹的不同點。①顧炎武拒絕談「性與天道」，而朱熹是要談「性與天道」的；②顧炎武主張「人有私情」，與「存天理、滅人欲」的程朱理學是「背道而馳的」；③顧炎武提倡「格物、窮理」不是為了追求「性與天道」，目的在於找到「國家治亂之源，生民根本之計」，「將視野擴展到廣闊的社會現實中去了」〔註 28〕。所以顧炎武是反對朱熹的。有的學者則認為顧炎武與朱熹存在著歧點，卻不是對朱熹的完全否定。如趙儷生、周可真等學者認為，顧炎武與朱熹有歧點，但這個區別只是在於：朱熹的特點在於演

〔註 23〕 王茂：《清代哲學》，安徽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243～244 頁。

〔註 24〕 周予同、湯志鈞：《從顧炎武到章炳麟》，《學術月刊》1963 年 12 月號，第 47 頁。

〔註 25〕 余英時：《清代思想史一個新解釋》，《中國哲學思想論集·清代篇》臺灣水牛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35 頁。

〔註 26〕 侯外廬：《中國早期啓蒙思想史》，人民出版社 1956 年 8 月版，第 206 頁～207 頁。

〔註 27〕 王茂：《清代哲學》，安徽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243～244 頁。

〔註 28〕 陳祖武：《清初學術思辨錄》，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62 頁。

繹，而顧炎武是「一條歸納的道路」〔註 29〕，是「基於後天經驗而歸納出來的，這才是其根本區別所在」〔註 30〕。

其三，顧炎武的「風俗」思想。風俗是顧炎武的重要思想和觀念，顧炎武認為「國家的興衰，社會的治亂」，「只是一個人心，風俗的問題」〔註 31〕。風俗是顧炎武思想的核心。前人論述了風俗與顧炎武其它思想的關係，如「重流品、重厚抑浮，貴廉、倡耿介、倡儉約、愛國」等等觀點，都與重風俗有關〔註 32〕。前人不僅論述了顧炎武「風俗」與其它思想的關係，還論述了顧炎武認為風俗形成的原因，有的學者認為明代「知識界有著不可推卸的歷史責任」〔註 33〕。解放前，有的學者就已指出，顧炎武認為社會風俗的主導是領導者。何貽焜則指出了顧炎武對風俗思想的邏輯脈絡，「社會的盛衰是以社會道德、社會風俗為轉移；社會道德、社會風俗，是隨時都可以因人力而變遷，而變遷的主因，大部份由於政府領袖的提倡，其餘一部份則由於社會學者的嚮導；這便是顧先生的風俗觀，也可以說是顧先生歷史的社會觀」〔註 34〕，也就是說專制君主是導致風俗敗壞的主因。

其四，顧炎武學術思想產生的原因。關於顧炎武思想是如何產生的問題，前人已有過一定的探討，有的學者關注了明朝滅亡對顧炎武產生了刺激，這使得顧炎武思考了明朝滅亡的原因。顧炎武創立實學風氣的目的即在於改變明代學術風氣的不良影響〔註 35〕。周可真則從資本主義萌芽的角度，論述私營觀念對顧炎武思想產生的影響。筆者認為關注於客觀形勢的變化認識是正確的，但是如果僅僅限於此，那麼又是不全面的。一些學者在關注於明末時代變化的客觀形勢對顧炎武產生影響，同時，也注意到對顧炎武實際生活的考察，如趙儷生考察了顧炎武自幼生活經歷，指出，顧炎武的嗣祖父顧紹芾和繼母王氏對顧炎武人生的影響巨大，顧紹芾教育他「讀書不如鈔書」，繼母

〔註 29〕 趙儷生：《亭林學派述》，《讀書通訊》第 151 期，1948 年 2 月。

〔註 30〕 周可真：《顧炎武哲學思想研究》，當代中國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17 頁。

〔註 31〕 陳祖武：《清初學術思辨錄》，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58 頁。

〔註 32〕 葛兆光：《中國思想史》第二卷《七世紀至十九世紀中國的知識、思想與信仰》，復旦大學出版社 2001 年第 1 版，第 384 頁。

〔註 33〕 陳祖武：《清初學術思辨錄》，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55 頁。

〔註 34〕 何貽焜：《顧亭林的社會觀》，《師大月刊》第 22 期，1935 年。

〔註 35〕 魏長寶：《論顧炎武的理學思想》，《河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0 年第 4 期。

王氏要求他「勿爲異國臣子」〔註36〕。這兩點是顧炎武一生的準則。有的學者則認爲顧炎武的思想體系是明代社會「各種文化思想相互撞擊的結果，是在當時複雜的歷史條件下形成的」〔註37〕。這些觀點對於揭示顧炎武思想的成因具有一定的啓示意義。

其五，顧炎武的史學成就。關於顧炎武的史學方面，一些學者從史書編纂和史學思想上論述顧炎武的史學成就。

在史書編纂方面，鄒賢俊認爲顧炎武在史書編纂上也有很高的成就。他對搜集史料的基本要求有三。第一，要廣集博採；第二，注重原始的直接史料；第三，不盲目迷信資料；周文玖《顧炎武論史書編纂》認爲顧炎武「把史家的主體修養與處理史料統一起來，並著重從史料的角度論述怎樣才能撰寫信史」。在史學思想方面，周文玖《顧炎武的史評及治學》一文指出，顧炎武有「物來而順應」〔註38〕的哲學思想。顧炎武在史學史地位表現在如下兩個方面：一、鑒往訓今的史學價值論；二、重「器識」，求「實學」〔註39〕；許蘇民指出，顧炎武「繼承並具體論證了「六經皆史」的思想〔註40〕。

前人對顧炎武的研究已經非常深入和豐富，涉及到了顧炎武思想的方方面面。但是仍然有很多的不足，主要不足在於缺乏對顧炎武著作如《日知錄》、《天下郡國利病書》著述體系的整體把握。由於缺乏對顧炎武著述體系的整體把握，因而以此得出的一些顧炎武的思想，難免是片面的，甚至有的觀點與顧炎武的本意存在著偏差。

由於集中反映顧炎武哲學思想的著作《日知錄》採用「條目」的形式，因此人們很容易忽視其中內容之間的內在邏輯。故而，學術界對《日知錄》是不是一部著作也產生了分歧。由於對顧炎武著作本身的認識存在分歧，那麼自然會對顧炎武思想的闡釋和理解產生影響。

有的觀點認爲顧炎武的《日知錄》不是一部著作。早在清代，章學誠就

〔註36〕 趙儷生：《顧炎武新傳》，《趙儷生文集》第三冊，蘭州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15頁。

〔註37〕 盧興基：《論顧炎武的學術思想》，《社會科學研究》，1989年06期。

〔註38〕 周文玖：《顧炎武的歷史變革思想》，《山西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1994年第3期。

〔註39〕 周文玖：《顧炎武的史評及治學》，《安徽史學》，1997年第1期。

〔註40〕 許蘇民：《顧炎武思想的歷史地位和歷史命運》《雲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1期。